

歼击机实施对地火箭弹攻击

瞒天过海 低空突防

“老飞”体验中国空军“红旗靶场”

“红旗靶场”是美国空军内利斯空军基地的别称,以举行“红旗演习”闻名,美军声称多数实战都不如“红旗演习”凶险。而在中国,世纪之交,我军在大西北打造出“红旗靶场”的训练基地,那里净空条件好,又有各类仿真靶标甚至1:1的模拟机场,专供空军演练。多年前,笔者驾机转场2000多公里,在此参加合同战术演练,留下深刻印象。



歼击机准备出击 本文配图 杨盼 摄

利用盲区突防

那次演练涉及多个兵种,空军采取“抽签式”组织、“背靠背”指挥、“面对面”真练的模式,务求贴近实战。我参加由歼击机、强击机混编的八机编队,临空轰炸“敌”地空导弹阵地。为了隐蔽行踪,八架飞机以无线电静默起飞,在空中编成两个四机编队,保持着大间隔、距离和高度差,打头的四机编队都是歼击机,后四架全是强击机。我驾驶歼击机编队里的三号机,和四号机承担特殊使命——“以歼代强”,即客串强击机的对地攻击任务,本该携带空空导弹的歼击机却挂上航空炸弹,犹如“骑兵步战”。

经过一段飞行,转了两个弯,我们接近

“敌”雷达探测范围。按照计划,我们边转弯,边下降高度,因为这样做能利用地球曲率(地球是圆的,雷达波却是直的,无法探测远方地平线下的目标),飞机穿插雷达盲区,隐蔽接近目标。

摆脱“敌机”纠缠

终于完成最后的转弯,机群直冲战区,“敌军”这才恍然大悟,急调两批共八架歼击机拦截。

看起来,双方飞机一样多,可实力并不对等,作为攻方的我们仅有两架适合空战的歼击机,我和僚机(四号机)所驾的歼击机都挂满航弹,空战能力明显下降,那四架强击机只有简单的自卫能力,难以空战格斗。

“敌方”没理睬我方歼击机,集中兵力

围歼强击机。对手目标很明确:只要粉碎空袭,保全地面目标,就算成功,至于是否击落护航的歼击机都是次要的。但他们没注意到,我方歼击机里暗藏两架“改行轰炸”的歼击机,这将是他们的“致命疏漏”。

双方对头相遇,由于受当时机载雷达及武器性能的限制,均无法实施对头攻击,都需要在接敌后反转“咬尾”,占据有利位置,对目标进行尾后或侧方攻击。就这样,双方互相冲入对方阵型,然后再实施水平或垂直机动,伺机占据攻击阵位。一时间,空中形成混战状态,难分敌我。

趁着混乱,我们这两架“改行歼击机”不仅没去寻“敌”,反而直奔目标,并把飞行高度直接压到超低空。此举意在摆脱“敌机”拦截,利用俯冲帮助飞机尽快增速,同时考虑到离目标越来越近,仅在低空已无法躲避“敌”地面雷达,尤其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的瞄准了。

临空突击成功

高度越来越低,大地几乎扑面扑来,直到高度100米,我和僚机才改为平飞,尽可能压缩“敌”雷达发现的时间窗口。当然,

“敌”雷达也不是吃素的,很快发现了我们,机载告警器“嘟嘟”响个不停,我索性带着僚机迅速拉杆,让飞机急速跃升,重回中空,开始搜索目标。眼见全向告警装置显示屏上突显“敌”导弹制导雷达锁定的信号,我迅速施放干扰弹,在机身外形成一片强烈的雷达信号,混淆雷达的“视听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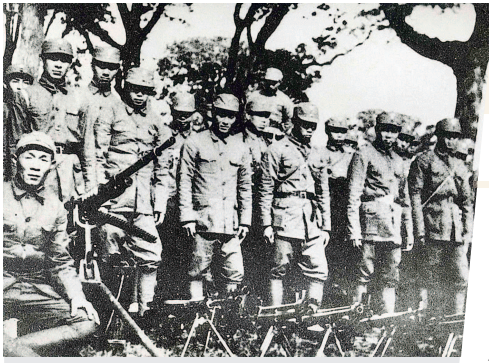
对抗中,我突然看到“敌”地空导弹阵地(按1:1比例建造的模拟阵地)就在机头下方,已来不及按部就班建立攻击航线,必须取捷径直接临空轰炸。我带领僚机先围绕纵轴滚转180度,让飞机进入倒飞俯冲,俯角达到30度时再围绕纵轴滚转180度,重回正飞状态,对正阵地冲过去!高度在急剧下降,终于构成了投弹条件,我和僚机瞬间把航弹悉数投下,然后奋力拉杆,让飞机一个急跃升快速爬升,随即压杆形成大坡度,转弯脱离战场。我借机回头一看,“敌”阵地已是火光冲天,表明它被摧毁了,空中进攻目的达成。

方滨

名家论战



重型歼击机演习归来



新四军缴获敌人武器

骁勇善战逞神奇

记名将陶勇在苏中反“清乡”

冒着敌机扫射,骑马到一线指挥……他是指挥员,又是队列中的普通一兵。对他这种战斗作风,上级常常喜忧参半,有时不得不劝他不要做“拼命三郎”,他却有自己的想法:“我的部队底子薄啊!队伍发展快,成分复杂,又没时间整训,只有靠打仗练兵,只有靠我们指挥员带着战士冲啊。”

日伪全面“清乡”遭受沉重打击后,又从武汉调来青木旅团,采取梳篦、拉网式战术,分十几路向中心区分进合击,反复“清剿”。为彻底打破敌人封锁,陶勇带领干部战士深入群众,发动民工同日伪磨洋工,破坏封锁线,组织群众乘隙向封锁圈外转移疏散,同时不断袭击日伪据点,破袭封锁线。7月1日,陶勇统一指挥,发动数十万军民在280公里封锁线上展开破击,一夜间,日伪经营3个月的封锁篱笆化为灰烬。

车桥奏捷

1944年春,陶勇率3旅主力跳到“清乡”圈外,在高邮、兴化、宝应等地连续进攻。车桥是日伪军重点经营的据点,四周筑有大土围子,外壕里面还有许多土围子,沿大小土围有53座碉堡,还有许多暗堡封锁地面。敌人摆明是以深沟高垒欺负缺少重武器的新四军,但陶勇的部队“偏向虎山行”,3月4日午

夜,7团分两路向土围袭击,突击队员闪过外壕,同时架起数十架云梯,登上围墙,随后战士们潮涌般冲进深壕,到5日下午,车桥解放,我军毙伤敌人298人,俘168人(内含日军中尉以下48人),创华中生俘日军新记录。被俘的日本炮兵中尉山本一山说:“这次战斗失败,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。”一等兵水野正一伸出大拇指说:“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,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。”伍长石田光夫感慨:“我现在清楚知道了,日本兵战斗意志,完全比新四军低下。”他们凄然啜泣:“皇军日暮途穷了!”

5月中旬,苏中区党委发出“抓紧反据点斗争”的号召,陶勇指挥分区主力连续出击。3旅特务第四团突入“清乡”圈内,首战董家甸取得胜利;接着,东南警卫团又攻克竖河镇。6月23日,有“新四军老虎团”之称的7团在如东把齿林全歼外出“扫荡”的日伪军500余人,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。

陶勇还十分重视改善部队武器装备。日军为对付新四军,专门配备射速快、有夜间瞄准具的九六式轻机枪(外号“弯夹子”),他们传说:“天皇有令,部队如被击散也要先毁掉此枪,不能落到新四军手里。”陶勇听说后向部队发出号召:“把什么‘歪把子’缴来我看看,先缴一支,再缴一打,大家比赛,看谁先缴到。”他亲自布置分区特务营两个连,以“掏心



我军在转移途中

战术”夜间突入封锁圈内,打掉兵房镇据点,抓到一个日军,缴了一挺九六式机枪。陶勇之威名,使苏中日伪军闻风丧胆。

1944年12月,陶勇奉命率3旅主力一部,随粟裕南下,发展苏浙抗日根据地。临行前给留在四分区的战友写信:“这次与你们分别了,我心里难过得很……我们在一起工作,你们对我帮助很多,一下子与你们分别,我就像掉了一只手一样……我没什么东西送给你们,只好送一点香烟给你们吸。”这道出陶勇对南通的依恋。南通人民也爱戴陶勇,1958年5月,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陶勇陪同下,由昆明舰专程南通访问,老百姓第一次到人民海军舰艇上参观,萧劲光看到群众排着长龙上舰参观,军民一家亲,赞叹道:“陶勇在南通的威信真高啊!”

张绮 李乐德

红色征程